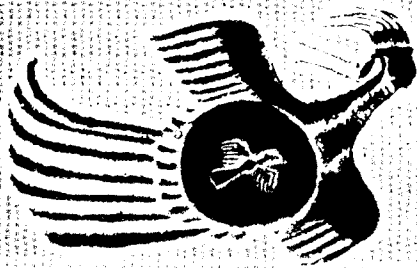


# 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

巴蜀古代文明研究  
段渝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段渝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2  
(中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80616-791-9

I. 政... II. 段... III. 文化史-研究-四川-古代  
IV. 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463 号

## 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

——巴蜀古代文明研究



作 者——段 渝

责任编辑——张建一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25

字 数——37.5 万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7-80616-791-9/K·35

定 价——25.00 元

## 目 录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文明起源** ..... ( 1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与文明起源的一般关系 ..... ( 2 )
- 第二节 四川盆地古代文明的向心结构 ..... ( 3 )
- 第三节 巴蜀文明差异的生态原因 ..... ( 9 )
- 第二章 文明起源时代古蜀政治组织的演进** ..... ( 16 )
- 第一节 概 说 ..... ( 16 )
- 第二节 三代蜀王与古蜀首邦 ..... ( 18 )
- 第三节 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与首邦社会 ..... ( 27 )
- 第三章 巴文化与巴地的族群和政治组织** ..... ( 54 )
- 第一节 关于巴文化的几个问题 ..... ( 54 )
- 第二节 从部落到首邦：廩君集团政治组织的演进 ..... ( 70 )
- 第三节 板楯蛮的大姓与首邦 ..... ( 79 )
- 第四章 三星堆文化：神权政体与文明** ..... ( 83 )
- 第一节 神秘王国的发现 ..... ( 83 )
- 第二节 神权政体的揭示 ..... ( 90 )
- 第三节 神权：政治权力的宗教化 ..... ( 108 )
- 第四节 神权政体的运作系统 ..... ( 121 )

第五节	从三星堆文化看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	(141)
第六节	三星堆文明的遗产 .....	(144)
<b>第五章</b>	<b>巴蜀的政治制度与礼乐文明</b> .....	(158)
第一节	国家演进的模式 .....	(158)
第二节	文化与政治变革 .....	(172)
第三节	从新都大墓看蜀国的礼乐文明 .....	(184)
第四节	尚五观念的起源和传承 .....	(195)
<b>第六章</b>	<b>分级制城市体系的形成</b> .....	(204)
第一节	早期城市的发现和确认 .....	(204)
第二节	城市起源:聚合模式 .....	(219)
第三节	城市结构:人口、功能结构和规划 .....	(225)
第四节	城市体系:等级与网络 .....	(232)
第五节	多元演进:蜀与中外古代城市的概略比较研究 .....	(236)
<b>第七章</b>	<b>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b> .....	(243)
第一节	学术源流回顾 .....	(243)
第二节	巴蜀方块字——表意文字 .....	(247)
第三节	巴蜀符号——象形文字 .....	(256)
第四节	关于巴蜀符号性质的几点辩证 .....	(264)
第五节	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与汉语古文字的关系 .....	(269)
<b>第八章</b>	<b>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b> .....	(274)
第一节	古蜀的青铜合金技术 .....	(274)

第二节	青铜器种类 .....	(293)
第三节	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文化形式的 来源 .....	(309)
第四节	巴国的青铜与青铜器 .....	(325)
<b>第九章</b>	<b>古代巴蜀与中国丝绸的起源 .....</b>	<b>(319)</b>
第一节	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 .....	(319)
第二节	嫫祖与中国丝绸的早期起源 .....	(333)
第三节	嫫祖与巴蜀蚕桑丝绸的起源 .....	(352)
第四节	巴蜀丝绸对中国和世界文明 的贡献 .....	(364)
<b>第十章</b>	<b>巴蜀文化与夏商周文明 .....</b>	<b>(372)</b>
第一节	黄帝与巴蜀 .....	(372)
第二节	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 .....	(387)
第三节	蜀与商文明 .....	(395)
第四节	宗姬巴国与西周王室 .....	(409)
<b>第十一章</b>	<b>巴蜀文化与楚和南中诸文化 .....</b>	<b>(415)</b>
第一节	巴、蜀与楚的政治和文化关系 .....	(415)
第二节	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蜀与南中 诸文化的关系 .....	(437)
<b>第十二章</b>	<b>巴蜀文化与秦汉文明 .....</b>	<b>(461)</b>
第一节	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 .....	(461)
第二节	巴蜀文化连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	(489)
第三节	从巴蜀的巴蜀到中国的巴蜀 .....	(500)

## 第一章

# 生态环境与文明起源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不同地理环境对各人类群体的性情、心理和气质等所发生的不同影响<sup>①</sup>。西方学术界自18世纪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出版以后,普遍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的重要作用,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模式的重要影响。中国自20世纪初年节译出版《论法的精神》(译名为《万法公理》)后,学术界中以梁启超为首,高谈阔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sup>②</sup>,而“地理史观”竟一时蔚然成风。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地理与文明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毕竟起步较晚,深度和广度存在明显不足。近年虽有论著探讨地理和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却多限于哲学意义上的讨论,还缺乏从文明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的论著。至于区域文明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关系这类课题,涉猎者更不多见。而要研究文明或文明起源,必须首先从它们的生存环境开始。

<sup>①</sup> 中国资料可以《禹贡》、《史记》等为例。古希腊资料见 Hippocrates, *Influences of Atmosphere, Water and situation*, ch. 13, 24.

<sup>②</sup>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与文明起源的一般关系

人们都承认,生态环境在文明起源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地理位置(经度、纬度,主要是后者)、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动物、植物、矿藏等因素,对文明是否能够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简单地说,这些要素不仅对人类群体的经济类型,对作为古代文明的物质基础的农业、定居以及农村和城市,从而对推动和促进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有着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人们由发现和开发矿藏到冶炼和制造金属器,有着同样深刻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在对文明起源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讨论中,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指出,所有最古文明或早期文明发生的地域都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环境,绝大多数文明诞生在地理环境特别有利的温带和亚热带,这是因为温带和亚热带在自然条件方面富于差异性和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只有这样的地理环境,才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sup>①</sup>。而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如寒带、亚寒带,无论如何也发生不了早期文明。但自然资源过于富饶的地区如热带的大多数区域,又会使人们过分依赖自然,反而束缚以至削弱人们同自然进行斗争的意志和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发展,同样也不会发生古代文明。

关于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除了早已为学术界所摒弃的一元传播论即世界文明发生在埃及并由此向各大洲传

播的说法外,当前有影响的说法一般认为有六大发祥地。英国考古史家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归结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秘鲁<sup>①</sup>。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提出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六个文明古国是: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玛雅和安第斯<sup>②</sup>。也有学者较笼统地指为埃及、西亚、印度、欧洲、中国和美洲<sup>③</sup>。国内过去一向持四大文明古国说,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应增加爱琴文明<sup>④</sup>。尽管这些看法不尽一致,但从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看,这些古文明发祥地绝大多数处在温带或亚热带,在气候、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都是特别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前苏联史前学家柯斯文认为,世界最古国家亦即最古文明国度“所在地理区域是地球上一个并不很宽的地带,大约在北纬十五度到四十度之间。”<sup>⑤</sup>虽然所指地理区域和地球纬度不尽合乎实际,但却均在温带和亚热带之内。

## 第二节 四川盆地古代文明的向心结构

就巴蜀文明而论,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整个川渝地区环

① G.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p.24, 1968.

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9页。

③ Arthur Gotterell,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p.8, 1980.

④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⑤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张锡彤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250页、251页。



境的差异<sup>①</sup>,便不难发现,只有四川盆地才具有成为文明发祥地的自然基础。

四川盆地自西而东由盆西平原(成都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构成。盆西平原面积辽阔,地势平坦,土质较好。盆中丘陵土层深厚,溪流纵横。盆东平行岭谷水源丰富,谷地广布丘陵平坝。整个盆地气候温湿,矿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自然条件有利于农耕和定居。而盆地边缘山地气温较低,降水较多,农耕条件一般不好。川西高原地表切割深,相对高差不大,曲流虽多,却排水不良,形成沼泽,加上气候干旱寒冷,因此在古代社会不可能发生农业。但高原面积辽阔,水草丰茂,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尽管高原和盆地边缘山地富于矿产资源,但人类文化初期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地表上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生产资料自然富源的利用则是在人类文化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川西高原和盆地边缘的大部分地带不可能成为文明发祥地。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盆地地理的另一个优越条件,那就是由盆地与周围边缘山地所共同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利于古文化中心在盆地的形成。

我们知道,盆地边缘山地是一系列中山和低山,北缘有米仓山、大巴山,是秦巴山地的南翼;西南有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地貌类似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西南缘有大凉山,南缘有大娄山,是气势磅礴的云贵高原的一部分;东缘有巫山、七曜山,与湘鄂西山地一脉相承。在交

<sup>①</sup> 主要参考资料: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编:《四川地理》,《西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专著,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主编:《四川省情》第4、5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中国自然地理》,1984年。

通极不发达的史前时期,这些阻隔盆地与外界联系的山地固然不是不可逾越,但毕竟起着极大的限制作用。而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地理上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为新的古文化中心的形成提供自然基础。这样,这一地理单元内古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对文明起源产生无可置疑的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文献方面,这里不妨以构成早期蜀文明源头之一的蚕丛氏为例子以说明。蚕丛氏原为西北氏族的一支,发源于岷江上游河谷,约在夏代前后便已辗转移徙到达成都平原<sup>①</sup>。是什么原因促使蚕丛氏由高山峡谷向低地平原移民呢?蚕丛氏本来就是以一个经营高地农业的部族登上史前史舞台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汶山郡有“六夷七羌九氏”,其中“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的部族就是冉駹,即蚕丛氏后裔未南迁进入低地平原的一支。因为这既同于蚕丛“居岷山石室”<sup>②</sup>,同时冉駹的读音也与蚕丛相近<sup>③</sup>。这就说明蚕丛氏早已成为定居部族,而定居通常是与农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魏略·

① 段渝:《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

② 《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

③ 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氏传》记载西晋以前氏人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家庭手工业<sup>①</sup>,虽然年代稍晚,但从汉初蚕丛氏后裔冉駹的情况看,蚕丛时代已发生了粗放的高地农业却是可以肯定的。汶川增坡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窖藏所出生产工具<sup>②</sup>,就可作为蚕丛氏主要经营农业的实物证据。

从较大范围看,作为一个高地农业部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通常具有向低地农业区移民的发展趋势。《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1分册的作者根据对伊朗高原以西家畜和种植作物的最早中心地的研究成果,断言近东、中东农业和农村的最早发展是在高地,而低地平原的农业则出现较晚<sup>③</sup>。根据徐中舒教授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实际上也存在一个高地农业和低地农业问题,而作为商周时代生产力最高指标的井田制,就是从高地农业基础上在肥沃低地逐渐发展起来的田制<sup>④</sup>。中国西北部的氏羌也是如此。氏羌同源异流,《逸周书·王会》孔晁注:“氏(低)地之羌羌不同,故所谓羌,今谓之氏矣。”古氏、低二字恒通<sup>⑤</sup>,氏族实际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后由高地向低地发展并经营农业的族类。

蚕丛氏活动的岷江上游地区属于高山峡谷地貌形态,山势陡峭,河谷狭小,气候干寒,只适合粗放农业。而沿着岷江河谷下行,不远便南出山区,进入辽阔的岷江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因此从地理上看,蚕丛氏所以向盆地平

①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

② 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③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 book. 1, p. 251, 1970。

④ 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⑤ 《说文·氏部》“氏”字下段玉裁注。

原移民,就是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更加有利于农耕的缘故。这也是古代社会的氏族部落为适应生态环境而迁徙的一个生动例子。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盆西平原是第四纪以来所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岷江顺地势从西北而来,流贯其间,每逢夏秋上游涨水,平原必受其害。因此,蚕丛氏移民进入冲积平原,就必然面对洪水泛滥成灾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蚕丛氏不对洪水问题有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较熟练的治理办法,要在冲积平原立足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对此应怎样解释呢?徐中舒教授认为,蜀人自古就创造了用杓槎和竹络笼石截流并分段排水的工程技术<sup>①</sup>,这种办法应当是高地农业和低地农业的治水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当然也不排除各自独立发明的可能。古史传说屡见禹迹在石纽的说法<sup>②</sup>,或说禹生在汶川郡广柔县<sup>③</sup>,或说石纽“在蜀西川”<sup>④</sup>,总之均指今岷江上游汶川、茂汶、北川一带。此说固然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sup>⑤</sup>,但古人为什么把禹迹设定在岷江上游而不是其他地方,却值得深思。禹自古以疏导洪水、划定九州著称于世。按照《禹贡》所指地域范围,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区恰恰在他疏导洪水的范围以内。透过这一传说,我们不能不说它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岷江高山峡谷之间的农业部族同岷江泛滥进行斗争的史迹。蚕丛氏早期居息在岷江上游河谷,其年代上限

① 徐中舒:《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②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及裴注,《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华阳国志》。

③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注引譙周《蜀本纪》。

④ 《吴越春秋》卷6《越王无余外传》。

⑤ 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43页。

正与古史中的五帝大体相当<sup>①</sup>。同时,由于河流深切,两岸谷地背靠高峻的群山,一旦上游山洪暴发,谷地极易淹没(这种情况至今而然),因此必然存在一个与每年夏秋之际岷江定期泛滥作斗争的问题。由此看来,与其把这一地区治水的功绩归于禹,毋宁归于有实际治水需要的蚕丛氏。蚕丛氏由高山峡谷向盆地平原移民,既是受地理上向心结构吸引的结果,同时也在于它具备了在平原立足所必须具备的治水能力。

地理的向心结构对古文化发展轨迹向心结构的影响,还可从考古学上加以认识。简单地说,在古文化的地域分布上,在成都平原及其四周发现的许多文化面貌各不相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遗址或遗物,大都呈现出向成都平原发展的趋势。例如,岷江上游汶川增坡石器窖藏,不论器形还是石材用料,均与广汉真武宫所出相同,而在年代上却比广汉真武宫所出为早<sup>②</sup>。又如,四川盆地以北嘉陵江上游地区的张家坡和邓家坪遗址<sup>③</sup>,在石器、陶器等方面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一定联系,年代上则比宝墩文化早一二个阶段,可能是宝墩文化的来源之一<sup>④</sup>。由此可见,成都平原各个遗址,在古文化内涵上多蕴含了四周各地古文化的一些因素,它的早期文明是汇聚了各种古文化而得以发展的。这不论在年代还是文化面貌上均无一不与考古资料相吻合。

① 段渝:《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

② 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源流》,《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③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④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1997年,打印稿。

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若干古文化在某一个多少被地理环境所隔离、所防护而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中的汇为一流<sup>①</sup>。四川盆地由于山川走向所造成的向心结构,也正是它能够成为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和各族汇集的中心所在的自然基础。成都平原文明起源时代古文化遗址中众多各具特色的文化成份的汇集、融和现象,已清楚地展示出这一点。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地处安宁河谷地的西昌礼州文化<sup>②</sup>,虽已发展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农业文化,但由于该地地形上北高南低,安宁河自北而南注入雅砻江,在自然地理区划中不属盆地的向心结构,并且它在与周围古文化的交往关系中也不具备居中的地理位置,相反却更趋向于与云贵高原连成一体,它的文化面貌也更接近于云南龙川江流域的大墩子文化,因此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就不可能也确实未曾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 第三节 巴蜀文明差异的生态原因

人们习惯于把四川盆地东西两地的古文化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内的文化整体来看待,称之为巴蜀文化。实际上,盆地东部和西部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较早时期却并不具备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性质。尽管人们通常从地理角度把战国秦汉之际的巴蜀文化视为一个地方或区域文化类型,然而二者在事实上却存在显著差异。

①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张锡彤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250页、251页。

② 《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大体说来,成都平原文明起源较早,进入文明全盛期和文明持续发展的时间都比川东久远,文明成就也高于川东。

诚然,川东与川西在位置上同属于一个完整的盆地,气候条件差度不大,但地貌、土壤却有较大差别。成都平原是大河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面积较大,约有9500平方公里,土壤“青黎”<sup>①</sup>,土质良好,适合农耕。与成都平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的川中丘陵,土壤紫赤,土层深厚,溪流纵横,也是农耕的有利场所。而川东平行岭谷间虽广布丘陵和平坝,但平坝一般不大,农耕条件显然不如前者。在文明起源时代人们尚难以卓有成效地改变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川东农业的成果是远远比不上川西平原和川中丘陵的。据蒙文通教授研究,中国最早的地理专著《禹贡》对梁州的记载,是偏在岷、岷以南的蔡、蒙地区和成都平原,因为那是最早开辟的地区;而对嘉陵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东西汉水之间的大巴山区和荆州的西部却只字未提,因为那是没有开拓的<sup>②</sup>。参证考古资料和史籍有关记载,虽不能说川东至西周时代尚未开拓,但川东经济的确比川西落后,二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类型有相当差异,却是可以肯定的。例如在地下资源方面,蜀人较早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禹贡》记载梁州贡献璆、铁、银、鏹、笄、磬,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成都羊子山172号墓中曾出土铁三角架,证明至迟在战国时代蜀人已能用铁<sup>③</sup>,而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最晚也在商代,是中国冶金术起源的若干个中心地之一<sup>④</sup>。巴地进入青铜时代无疑要晚得多,目前只

① 《尚书·禹贡》。

②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8页。

③ 《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④ 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能见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实物资料。

我们准备一一备列川东和川西的经济差异,而只是指出成都平原在西周初年以后几乎已见不到以畜牧或渔猎为主的经济类型,考古资料似乎还可把这种状态的年代大大上推;而川东农业至迟在西周中叶还处于十分粗放的形态,它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并且与射猎经济并行。《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按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尽管关于蜀国农业始于杜宇的看法并无多少根据,新石器至夏商时代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农业情况便是一有力反证,同时《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川西平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以至认为是西周先公或上古农官后稷的归葬之处。但巴地较高级的农业确是晚于蜀地,而且很可能是在蜀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即使在战国秦汉时代,根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和《华阳国志》的记载,川东岭谷间的族群仍有许多以射猎为生。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sup>①</sup>。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巴蜀国家的规模,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古代文明的影响。

成都平原是古代蜀国的发祥地,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天然屏障可以阻碍文明起源最早因而是最为强盛的蜀国所必然进行的领土扩张。而这种扩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初的区域性一体化。尽管《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试图建构一个“三代一线”的大一统蜀王国模式的作法

<sup>①</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不符合历史实际,但“三代蜀王”(蚕丛、柏濩、鱼凫)时期蜀地内确实存在若干个族群角逐争雄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早期蜀族,标志着蜀文明的早期统一。

另一个事实是,由于治水工程的需要,促进了整个平原地区各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的协作,并以此为动力加速平原的一体化,终于使蜀成为地域辽阔的早期统一国家。从史籍可见,到春秋中叶的开明王国时期,蜀已能完成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治水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蜀的腹地玉垒山(今都江堰市境内)和金堂峡<sup>①</sup>,还向南发展到盆地边缘青衣江旁的乐山<sup>②</sup>,并在那里留下了治所的遗迹<sup>③</sup>。另据考证,开明氏“决玉垒以除水害”实际是开掘一条人工河道,分引岷江水流入沱江,而这一工程全靠人工开凿疏浚<sup>④</sup>,工程量之浩大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权对人力、物力的统一支配和征发,这一工程是难以实现的。反过来看,治水范围的扩大和对水利工程的统一规划与组织,恰好表明蜀王的权力已达到高度的集中和稳固。岷江泛滥是川西平原自然环境的一大特点,建立在这种自然基础之上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斗争,一方面取得“民得安居”<sup>⑤</sup>、“蜀得陆处”<sup>⑥</sup>的成果,极大改变了人们赖以生活和生产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一个统一政权的形成和巩固。

开明氏完成成都平原的统一后,迅速向四周开疆拓

① 《华阳国志·蜀志》,《蜀中名胜记》卷164,《读史方輿纪要》卷67。

② 邓少琴:《蜀故新途》,《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7页。

③ 《水经·江水注》。

④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7、108页。

⑤ 《輿地纪胜》卷164引《华阳国志》。

⑥ 《水经注》卷33引来敏《本蜀论》。